

苏家埠战役：

围点打援粉碎“围剿”

■胡遂远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地区（位于今六安市裕安区）成功进行一次围点打援战役。此役是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空前大捷，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

1931年11月，国民党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兵败黄安、商城之后，又于1932年3月纠合重兵进占皖西苏家埠、麻埠等地，继续向根据地疯狂进攻，对根据地构成了巨大威胁。3月22日起，红四方面军分割包围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3个敌军据点，诱打六安、霍山出援之敌。敌军被围数月，弹尽粮绝。蒋介石急令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2万兵力从合肥方向前往增援。红四方面军遂以主力打援，并于5月2日在陡拔河一带将其全部歼灭。

精心研判，巧选战法。战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经过侦察，发现国民党军虽以第46师、第55师所属第163旅和2个警备旅共12个团的兵力，从六安城至霍山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了一线防御，对根据地构成巨大威胁，但是敌二线兵力分驻于合肥、潜山、蚌埠等地，均距六安、霍山较远。

根据敌人的兵力分配情况，3月1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独山召开军事会议，认真研究对敌方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出，敌人虽然人多、武器装备好，但互不统属，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红军只要指挥得当，便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他根据淠河一线驻防的敌军后方存在较大空隙的战场实际，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具体战略部署是：地方武装从西面对敌实施佯动袭击，隐蔽主力作战企图；以红四方面军主力自两河口东渡淠河，从敌侧后分割包围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等地之敌，并依托有利地形，伺机歼灭来自六安和霍山方向的援敌。这样不仅能够克服红军暂无攻坚经验、缺少攻击技术装备等弱点，有效避免强攻敌军坚固据点时遭到援敌夹击陷入被动局面，还能充分发挥我军善于开展“运动战”的专长，集中主力形成局部优势，确保实现以弱制强，以少胜多。

抢抓战机，三打援敌。3月23日，在



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苏埠镇的苏家埠战斗前线指挥部旧址——永慧寺。

红四方面军对青山店、苏家埠形成围攻之势时，敌遂以2个团兵力从六安出发，沿淠河南下增援苏家埠，行进至韩摆渡附近时遭我军伏击，一部被歼，其余四处逃窜。这是苏家埠战役中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实现了旗开得胜、首战告捷的喜人局面。

由于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3个敌军据点工事坚固，不宜攻取，红四方面军决定在严密“围点”的同时，以第11师2个团置于六安西南之平岗头、樊通桥一线，准备打击六安方向援敌。刚进据点的敌守军神气十足，不断朝外放枪挑衅红军。当守敌看到红军工事层层逼近，几次组织试探性突围又都被红军挡回时，士气逐渐低落。经过一个时期的围困，陷入包围的敌军粮草断绝、信心动摇。国民党第46师师长岳盛璋眼看各地被困之敌陷入危急，决定孤注一掷。3月31日，岳盛璋再次组织六安和霍山4个团的兵力同时出援，并亲自督战。在岳盛璋的严厉催逼下，敌军先头2个团向我军第11师阻援阵地疯狂进攻，并一度突破我军防御。紧要关头，红四方面军将总预备队投入战斗，顿挫敌军进攻锐势，形成钳形夹击态势，将敌大部歼灭。此为二打援敌，大获全胜。

眼见六安、霍山之敌在我军重击之

下已回天乏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判断，六安、霍山的敌人遭此打击后，不会再轻易出援，下一步的援军可能会来自合肥。于是，预先在戚家桥、樊通桥以东地区设置了伏击阵地，除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之外，主力部队东移到陡拔河两岸，准备伏击来自合肥方向的援敌。4月下旬，蒋介石在岳盛璋的频频告急下，匆匆任命驻扎在蚌埠的国民党军第7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部2万余人分左右两路由合肥西进增援。5月1日，其先头部队与红军遭遇后，红军“且战且退”，将其引入陡拔河。当敌军的大部队渡河时，红军主力迅速从两岸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捣毁敌军总指挥部，活捉厉式鼎，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很快被歼。战至下午5时，敌2万援军全军覆没。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数次突围均未得逞，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及红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于5月8日全部缴械投降。至此，红四方面军三打援敌，连战连胜。

政治攻心，全民上阵。苏家埠战役伊始，我军便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对敌展开政治战、宣传战、攻心战、瓦解战，分化瓦解敌人。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派出宣传队，以通俗上口的顺口溜对被围之敌进行喊话宣传，如“老乡老乡，快

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等，对削弱敌军意志起到很大作用。

当敌人在苏家埠、韩摆渡被围数日饥饿不堪时，红军在敌军据点外摆放白面馒头，吸引敌军士兵。开始时，只有少数士兵偷偷过来用子弹交换食物，后来，据点内的敌军军心动摇，携械投诚者越来越多，纷纷加入了红军队伍。尤其是在我军全歼合肥援敌后，敌两地守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彻底陷入绝境，最终只得委派1名团长前来请降。5月8日下午，所有被围之敌均向我投降。至此，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能够获得全胜，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中共皖西北道委专门发布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配合红军行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军阀；六安县委专门成立“红军招待处”，各区、乡分别成立“招待站”，具体负责红军的物资供应和战斗支援；六安县三区 and 五区赤卫队在夜间打着灯笼火把，在两河口、老虎头为红军架起9座毛竹浮桥；皖西各地的群众组织，分别担任担架、运输、向导、站岗、搭桥铺路、救护伤员、慰劳红军、瓦解敌军、看押俘虏、协同作战等任务，形成了全民动员、全员上阵、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

此役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1人、旅长5人、团长12人及营以下官兵1.8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并击落敌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全面展开即被彻底粉碎。5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贺电称，这次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革命运动的领导”。苏家埠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著名战役，创造了红四方面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中国革命史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昭莫多之战

■赵涵泊 熊剑平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自乌兰布通之战败归后，在科布多重整旧部，又从沙俄处购买枪炮，经过几年经营，逐渐恢复元气。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再次发兵2万攻打喀尔喀蒙古，随后沿克鲁伦河一路东犯，进抵巴颜乌兰（今蒙古国温都尔汗西）。当年11月，康熙决定再次亲征讨伐，彻底解决漠西蒙古之患。

千里寻敌

按照康熙的进军计划，清军一共兵分3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路军9000人，出兴安岭沿克鲁伦河西进，堵住准噶尔军东进道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率西路军4.6万人，分别自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宁夏等地出兵，沿翁金河北上断其退路；康熙亲率中路军3.4万人，出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经克鲁伦河上游北上，与东西两路军夹击噶尔丹军。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2月28日起，清军各路人马依次启程。由于战线广阔、出兵地点分散，西路军费扬古部和孙思克部约会师于翁金（今蒙古国海拉尔郡兰），东、中两路大军约在土喇（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会合后等待，然后再相机而动。面对清军声势浩大的进攻，噶尔丹一面沿克鲁伦河西撤，一面将沿途青草尽焚，试图阻挠清军行军。这一办法果然奏效，西路军孙思克部2万余人出发后，一路气候恶劣、水草匮乏，4月11日到达翁金时，已经失期数日。费扬古遂改变计划，从孙思克军中挑选4千精兵随行，其余皆留下守粮或后续跟进。康熙得西路军奏报后，为防止孤军对敌，只得令中路军缓行以待。5月8日，中路军进抵克鲁伦河的准噶尔军大

营时，发现噶尔丹已于前一日弃营西逃。康熙发轻骑兵追击数日后，因其随军携带口粮消耗殆尽，只得下令班师。眼看此次出征就要徒劳无功之时，西路军传来好消息，轻兵而行的费扬古部兼程并进，终于在5月13日赶上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将狂奔5日的噶尔丹截住。至此，本次大战演变为噶尔丹同费扬古西路军的对决。

反客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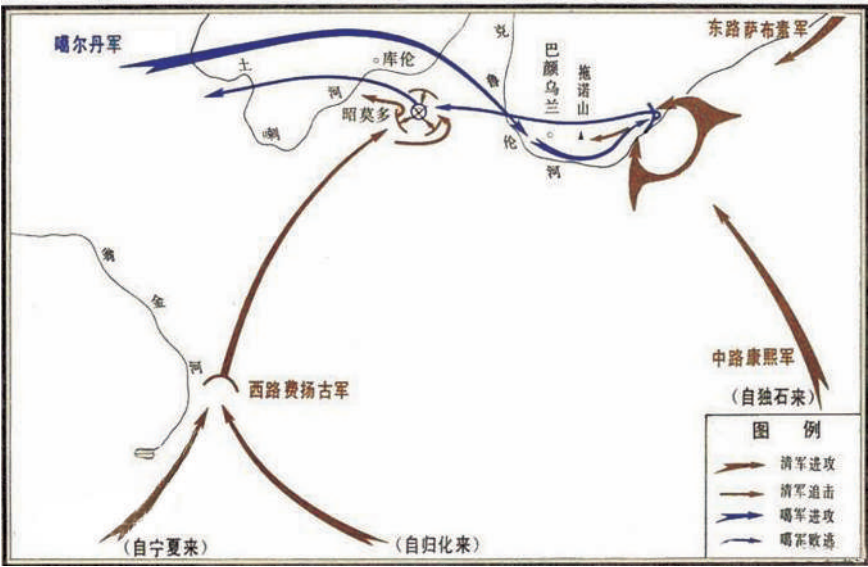
战役开始前，两军状况都不乐观。费扬古的西路军掉队严重，赶到昭莫多的只有1.4万人。噶尔丹为摆脱清军追击，沿途也抛弃了大量伤员和辐重，双方在昭莫多战场的兵力相当。为争取主动，费扬古先发兵抢占了昭莫多以北的山岭，而后将全军一分为三：以一部依山列阵于东，一部沿山下的土喇河布防于西，孙思克率步兵居中，扼守山顶。按照康熙战前所授方略，所有骑兵下马步战，待冲锋时再上马出击。

一切布置停当后，费扬古命前锋领岱率骑兵数百名，接敌后且战且退，将敌一路引至昭莫多山下。噶尔丹见山上人马不多，以为西路清军孱弱，便集中全力进攻清军控制的山头。因地形条件所限，准噶尔军也舍马步战，噶尔丹与其妻阿努亲自带头冲锋，攻势甚锐。然而，山

地攻坚作战，乃是清军所长，激战半日，准噶尔军未能冲破战阵。此时，费扬古见准噶尔军主力已被孙思克的步兵牵制住，其后方的辐重部队又缺乏保护，便及时调整部署，以骑兵一部偷袭其辐重部队，一部横冲入阵，据守山头的孙思克部也乘机出击，噶尔丹腹背受敌，全军崩溃瓦解，其妻阿努被火枪打死。清军趁夜追杀30里，至特勒尔济口方收兵，一路斩杀3000余人，收降千余人，俘获牲畜6万余头，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走。回到科布多后，噶尔丹众叛亲离，一蹶不振。在清军强大攻势的逼迫之下，于次年5月3日服毒身亡。

用兵得失

昭莫多之战前，噶尔丹汲取了乌兰布通失利的教训，竭力避免与清军主力会战。他采取了通过袭扰调动，用运动战消耗清廷国力，并伺机歼其一部的战法。从战役前期的发展态势看，这一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在噶尔丹的多次调动下，清军3路大军9万人中，仅费扬古部赶到战场，且饱受长途行军之苦，战斗力大减。因此在昭莫多这一局部战场，准噶尔军的兵力劣势不大，且相对具有以逸待劳的优势。不过，在具体战术应用上，噶尔丹频频犯错：先是因为轻敌进入了费扬古预设的主战场，将



攻守之势极易让人；战斗发起后，又会弃己方骑兵的优势，改为下马步战，同清军在山地短兵相接，可谓是以短击长；在兵力布置上，将全部兵力投入攻山战斗，没有留出必要的预备队，最终在清军的前后夹击下失败。

清军战前的准备非常充分。不仅针对准噶尔军的战术特点，给参战部队增发大批火枪，征召众多蒙古向导，携带大量树木、木材用以通过河流和沼泽地带，还为每名士兵配备1名民夫和4匹战马，随军携带5个月口粮，另有数万峰骆驼和7000辆大车运送粮食给养。虽然在深入漠北腹地数千里后出现局部断粮的情况，但总体完成了保障任务，确保了全军组织有序、进退得当。这其中，费扬古的表现尤其值得称赞。他先是因时用兵，果断地将全军精锐和粮草集中，采取轻兵锐进的战术，攻击准噶尔军要害，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面对敌锐我疲的情况，他能主动示弱，将对方引入自己精心布置的战场，并逼迫其放弃骑兵优势进行山地攻坚，可谓经典的“反客为主”。在具体的兵力布置上，清军奇正并用，步骑呼应，关键时刻出动骑兵袭其辐重，一举打破僵局。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苏区军民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赣西南、闽西的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为满足军民的通信需求，各根据地相继建立邮政管理机构，并开始发行邮票，苏区邮票就此诞生。

苏区邮票按年代先后，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2年之前，各地区自行印制的邮票，被称作“赤色邮票”。第二阶段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成立后，中央和各地区印制的邮票，一般被称为“苏维埃邮票”。



1931年2月从江西宁都南丰一带寄往湖南平江的信件实物。

没能寄到目的地的赤色邮票

1930年3月26日，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成立了全国首个赤色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同年5月至6月间，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发行了第一套赤色邮政邮票。因为年代久远，现在仍未发现这套邮票的实物留存。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形状为方形，所用纸张较薄，四周及中央绘有星形，上有赤色邮政及1分等字样。

同年10月，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再次发行了赤色邮票，一套3枚，面值为1分、3分、8分3种，颜色除3分为黄绿色外，其余均为蓝色。邮票图案为“8”字形花框，内直列“赣西南赤色邮政”字样，称作“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这套邮票保存下来的极少，基本上是以实寄封的形式留存，其中大部分实寄封由红三军团红5军第1师所属部队官兵，在1931年2月从江西宁都南丰一带寄往湖南平江。这其中的故事，还要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说起。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一次大“围剿”。立功心切的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留下一部分兵力驻扎东固，仅带两个旅向龙冈冒进，结果钻进了红军早已布好的埋伏中。其率领的第18师师部及两个旅被全部歼灭，自己也被活捉，红军由此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其中，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红三军团红5军，是由彭德怀等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队伍为主体组建的部队，部队指战员多为湖南平江县人。之后，红5军驻扎在江西宁都、南丰一带，官兵们纷纷利用休息时间给家人写信，报告胜利的喜讯。信封背面写有“胜利”“千里家音，一言难尽，内有要事，切勿遗失，企望回音”等字样，表达了红军在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喜悦和期盼收到家人回信的心情。然而，这些信件尚未到达目的地，就在江西萍乡被国民党军扣留，所以信封上只有宁都、南丰至萍乡间的邮局、站的戳记。

除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外，江西东北赤色邮政总局、中华赤色邮政湘赣边省总局、江西赤色邮务总局和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等根据地的邮政机构，也相继发行赤色邮票。由于当时各革命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所以各根据地邮政管理机构从满足各自根据地通信需要出发，发行了相应面值的邮票。

藏在旧牛皮里的苏维埃邮票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成立，统一管理 and 指导苏维埃邮政。建立统一的邮政系统，不仅关乎苏区通信的畅通，更关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公信力。

从1932年5月至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共发行9种不同面值的邮票。这些邮票票面均有“苏维埃邮政”字样。当时，中央苏区的邮票印刷条件十分有限，缺乏专门的设计人员，用于印刷的材料和专业印刷工人也严重不足。苏维埃邮政邮票的设计者黄亚光，在只有毛笔和一支借用的圆规的情况下，画出了飒爽英姿的红军战士、象征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旗帜、冲锋的红军队伍等图案。

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及经济封锁，湘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

中央苏区的红色邮票

■李若铭

区的联系时断时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发行的邮票不能及时送达。所以除中央苏区印制发行苏维埃邮政邮票外，湘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也分别印制发行了这种邮票。

苏区的邮政人员及其家属，对红色邮政事业充满感情。现存湘赣苏维埃邮政油印邮票多为原湘赣省邮政管理局局长陈致万的妻子刘娥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1933年6月，陈致万在牺牲前，将一块写着“中华赤色邮政湘赣省总局”局牌和部分苏维埃邮政油印邮票郑重交给妻子刘娥姬保管。湘赣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查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留下的物品，规定“凡不上交者罚款、坐牢、杀头”。刘娥姬用旧牛皮包好邮政局牌和邮票一并藏起来。曾经有人劝她将局牌和邮票交出去，以免性命难保，但刘娥姬始终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她把保存完好的局牌和邮票上交给国家。苏维埃邮政油印邮票这才得以留存于世。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同时，在瓦窑堡设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管理局。12月，西北邮政局发行了一套中华苏维埃邮政邮票，图案分别为红军肖像图、锤镰图、锤镰五角星图、单圈五角星图。

苏区邮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发行的。简陋的印刷方式，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初创时期的艰苦岁月，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简单的元素图案，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与邮戳一起成为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有效手段；低廉的邮资，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邮政从建立伊始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从赤色邮政到中华苏维埃邮政，每一枚邮票都见证着红色邮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

